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马永强 著

文化传播与 现代中国文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马永强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 马永强著. —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 1
ISBN 7-81052-631-6

I. 文… II. 马…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9560 号

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马永强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 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彭君华	印 张	9.2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631-6 / I·52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文学环境研究的重要性与格局的创制

——序《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马永强的这部著作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就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除了作者的严谨学风和清晰的逻辑表达外,最能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选题的新颖视角和作者在文学环境研究中的独特发见。

过去,我们只强调新文学发生和发展中的思想层面,也就是接受主体的研究,属于韦勒克说的那种内部研究。近年来从外部研究视角切入的文章和著作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像马永强这样用几十万字的篇幅来大规模地论述两者之间看似简单却有千丝万缕内在联系的皇皇论著尚不多见。作为相对独立而平行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和新文学是分属于两个俨然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当然各自有不同的规律可循,可是,它们在同一时空的界面上的相遇和相交,就有了不同凡响的历史意

义,就有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如果以往我们对它们的研究还处于心理学上的无意后注意的层面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学人在这个领域里所做出的努力,已经是进入了有意后注意层面了,马永强的研究也就是上升到了这一层面的成果。作为文学环境的研究,发掘现代传播对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影响与内在的互动关系,不仅成为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在学科的交叉点上会有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乃至成为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

把19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传播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前全球化”阶段,而把20世纪末的“全球化”指称为“后全球化”,这不仅仅是行文分期的方便,而是隐含着论者对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过程的独到识见。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为了将两次‘全球化’区别开来,这里引入‘前全球化’和‘后全球化’这样一个说法。前次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拓展,对于20世纪末开始的以信息技术和互连网为标志的‘全球化’,只能算是一次‘前全球化’。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追求,用殖民战争第一次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闭塞的中国也被卷入这一世界变革潮流。其次,比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农业文明,以现代化大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具有明显的世界性,不仅生产受世界市场的影响,而且消费也是世界性的,资本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追求世界市场

的渴求。这正如阿芒·马特拉认为的那样,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全球视为一个市场、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国富论》中提到的‘全球化’、‘宇宙化’,就是‘通过市场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共用空间’。第三,这一全球化的进程是与现代传播系统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比如,铅字印刷技术和大机器化的采用、普及,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明、应用,横跨大西洋的海底通信电缆的成功铺设等等,都为‘前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技术和信息支持。”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马永强的研究工作就显得十分从容与自信了。而他所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也就沿着这个轨迹迎刃而解了。

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19世纪中叶以降到20世纪“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期,这显然是马永强研究阶梯的第一阶段,后面的庞大研究计划当是他终身的学术研究目标。“清末民初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兴起,是‘前全球化’这一趋势的产物,但它提供了中外文化全面碰撞、对话的可能。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两种异质文化是如何在对话、碰撞中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新文学。现代传媒的萌芽、成长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共舆论’的作用?传媒和文化‘把关人’在整个清末民初文化传播历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文化人士的互动对文化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如何辐射到文学变革?所以,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播的发展史探索其对新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新文学的发生中寻找它的

历史渊源”。对于“前全球化”中的这些现象学、发生学的诸多问题,马永强都一一作出了严谨的论证,从中我们足可见出论者的治学态度和写作的风采。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在论者丝丝入扣的论述中,我仿佛看到了马永强孜孜以求、永不倦怠的学术面影。

马永强不是属于那种只凭天分为文的人,他以比常人多几倍的勤奋去读书,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尤其是这五年多来,他除了吃饭和睡觉,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读书和学术研究上去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他放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但是,他在做学问上决不马虎,对老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去思考和理解,即便是很细微的问题也从不放过,有时连我都觉得他过于认真了。如今回想起来,也就是凭着这股永不放弃的韧性和毅力,马永强跨越了许多学术上的关隘,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

我常常说:有的人没有文学的灵气,搞了一辈子学术研究,但是他至死都没有真正进入文学研究的内核之中;而有的人是有文学的天分的,但是他不肯努力,不肯花大气力去啃硬骨头,也就半途而废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天赋和灵气,又甘于坐冷板凳的人,才有可能去攀援一个又一个学术巅峰,而达到光辉的顶点。我以为马永强是属于后者那种敢于攀登险峰的学子,我也充分地相信他的能力和毅力。

作为马永强的博士生导师,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这

个物质化世界背后拱起的年轻一代的学术脊梁,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看到了一线学术的希望!

是为序。

丁 帆

2002年10月4日午夜于紫金山下

目 次

[1] 文学环境研究的重要性与格局的创制(丁 帆)

[1] 绪 论

[15] 第一章 现代传媒的登场和参与

[17] 第一节 十字军东征的“剑”与“火”

[30] 第二节 现代传媒的本土化

[48] 第三节 出版的文化自觉与民间立场

[64] 第二章 人的解放: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68] 第一节 新式学堂与人的解放

[83] 第二节 留学潮:文化的迁徙

[98] 第三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

[108] 第三章 公共舆论:文学变革的策源地

[110] 第一节 “公共舆论”的历史内涵

[116] 第二节 体制外的声音:公共舆论

[125] 第三节 文学变革的策源地

- [133] 第四章 文化传播的效果之一:文学生态的现代变革
 - [134] 第一节 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
 - [146] 第二节 文学传播的市场化
 - [158] 第三节 阅读群体的平民化
- [168] 第五章 文化传播的效果之二:
传播符号和文学话语的现代变革
 - [170] 第一节 通俗化与报章文体的演变
 - [181] 第二节 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联系
 - [194] 第三节 从文字改革到国语统一
- [202] 第六章 文化传播的效果之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
 - [203] 第一节 观念新变的精神追寻
 - [209] 第二节 文学:直面现实的求变
 - [227] 第三节 主潮过后的“消闲”
- [237] 第七章 文化传播的必然选择:“五四”新文学
 - [240]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现实背景
 - [252] 第二节 现代性:新文学现代化的冲动
 - [263] 第三节 新文学价值观的反思
- [272] 主要参考文献
- [281] 后 记

化”，就是“通过市场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共用空间”^①。第三，这一全球化的进程是与现代传播系统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比如，铅字印刷技术和大机器化的采用、普及，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明、应用，横跨大西洋的海底通信电缆的成功铺设等等，都为“前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技术和信息支持。

从此，人类文明的制导系统发生了变革，现代传播开始参与历史进程的建构。

在无法回避的“前全球化”的冲击下，机遇和危机同时走向古老的中国。

1840年，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枪击炮轰，自清初开始封禁的锁国大门在紧闭了二百多年后终于被迫打开。家国一体的正统秩序，泱泱大国的威仪、自尊，锁国闭关的安宁与平静，这一切似乎合法的运行轨迹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崩裂、走样，整个民族赖以维系的命运支点蓦然间粉碎了、消失了。从此，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古国便踏上了动荡、屈辱、戒备、迷惘的求索之路。

“时间的河谷出现了断裂，人们恰恰被抛弃在无可依傍的断层空间”^②。这描述的正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实状态。

痛楚与困惑的选择是无奈的，但谁让我们不早一点觉醒、自强呢？“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早在1815年，时代的预言家龚自珍就对封建衰世的命运发出警示。在《尊隐》篇中，他对比描述了“京师”和“山中”的景象。那“荣华富贵的最后一代”

① [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马特拉的词与物》，《世界主义与文化霸权（代译序）》，第9～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许纪霖：《无穷的困惑》，第1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和“受苦受难的最后一代”^①，就是对封建末世命运的宣言。作为封建专制集团的一分子，他想唤醒昏昏然的当政者，奋发图强，以避免衰亡的命运；作为主流话语圈的边缘人，他抨击时政，呼唤风雷，渴望革新力量的崛起，并将希望寄托在“山中”世界。他相信“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可悲的是，清醒者的呐喊被暗夜里的鼾声淹没，抑郁不得志的龚氏不得不道出最后的忧思：“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③

历史的发展，不幸被龚自珍言中。

一

面对突如其来的殖民战争，自大、麻木的政治集团束手无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软弱和无奈，但其灵魂仍然沉浸在天朝威仪的亢奋中。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统治者心态依然陷于“夏”“夷”的臆想构架，整个民族仍然缺乏深刻的反省和检讨，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更大的悲剧。因此，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最初见面和碰撞，只能是浅层次的、表面化的，它无法给病入膏肓的中华民族带来深刻的震撼和警醒。从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中

① 王俊义、曲弘梅编：《龚自珍魏源诗文选译》，第70页，巴蜀书社，1997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③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页。

国尽管已开始了被迫的门户开放和学习,但是,无论是洋务派还是保守派,对西方文明的整体认识都还十分模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①的思想在维新变法前占主导地位就是一个明证。

此间,除了器物层面的学习、引进,任何对传统文化、体制的怀疑和反思,都会受到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压制和警告,甚至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悲剧具有典型意义。1875年8月,清政府任命熟悉洋务的福建按察使、翰林郭嵩焘为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出使大臣,顿时谤声四起,舆论纷纷指责郭嵩焘为士大夫蒙耻。一首讽骂的联语这样写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②

在上下左右的指斥声中,郭嵩焘于翌年赴英,但厄运并未停止。作为驻英使臣的郭嵩焘携其夫人宴请外宾,这本是正当的社交礼仪,但舆论哗然,“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③。郭嵩焘的旅途见闻《使西纪程》按朝廷惯例寄回国内,文内记述了对外国政教见闻的观察,并指出了办理洋务的得失,意在为国内官员提供参考,但却遭到士大夫的群起攻讦。最后他不仅未得朝廷重用,而且受尽了保守派的攻击、嘲弄,于1891年

①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

②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三日,转引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39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③ 《申报》1878年11月15日。

抑郁而死。此番出使,郭嵩焘不仅受皇命差遣,而且由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多次召见,可谓恩宠有加。然而,在士大夫阶层的群起打击、排挤面前,连当初派遣他的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保全他,由此可见士大夫阶层保守思潮的势力之大、之强。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夏夷”观念和无知,将一位热心洋务的外交官逼上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祭坛。1881年,首批中国留美学生因长期受异域社会平等、自由思想和生活习俗的影响,遂有剪辮、穿西装、去教堂之举,士大夫闻风,批评、攻击他们“数典忘祖”、“丧失德性”^①,朝廷遂下令撤回留美幼童,使近代第一次官派留学中途夭折。上面的例证,只是戊戌变法前保守与革新势力相互抗争的一个侧面。由此可见,真正向西方的学习在当时十分艰难,充满禁区。朝廷上下,把持主流话语圈的当政者和士大夫阶层只是想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兵工、制造之术,他们在心底里认输的只是“技”不如“夷”人。所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人士,如覆薄冰地琢磨着怎样曲折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思想的萌芽处于非法状态。

搭乘商船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开始了他们全球化的宗教传布和文化传播。他们曾雄心勃勃地开列过一份影响中国士大夫的计划书,然而,在1890年以前,这种影响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倒是没有功名的下层人士在学习西方时表现得直率而又坦荡,这包括对西方器物的应用、谋生技能的掌握、医疗和教育的接受等。正如阿诺尔德·汤因比说的,“在接受世俗化

^①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541页。

业发展史”^①。陈平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很早就注意到了报刊研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认为“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与其发表形式与生产流程大有关系”,“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②。我以为,这一看法确实一语中的。王瑶不仅注意到了刊载形式的不同对文学的影响,而且,也看到了文学生产、传播、买卖的文学生态系统和流通过程对文学的影响。现代传媒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它直接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思维形式,将文学纳入一个公众参与消费的空间,只有回到这一特定的氛围中,作家真实的精神状态和作品的价值才会在文学史家那里得到真实的显现。同样的话题,在新闻史研究专家方汉奇那里也得到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不仅中国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通过报纸与读者见面的,而且,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也是通过报刊这个阵地滋生、发展起来的^③。在实际研究中,阿英、张静庐两位很早就致力于晚清报刊与现代文学史料的辑录和整理。学人中郭延礼、吴小美、陈平原、袁进、王中忱、杨义、陈万雄、杨扬、刘纳、孙晶、栾梅键、鲁湘元等人先后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传播媒介和近现代文学的研究。或从宏观入手,探讨新式媒介的兴起与文学的生产、传播、发展;或从文学报刊史的角度编写“新文学图志”;或致力于文学报刊、社团、出版机构与现代文学的专门研究;或

①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8页、第8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76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从市场经济和稿酬制的视角探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总之,他们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学说的引入,使进入 21 世纪的文化传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特点,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出现了一批博士论文,从“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视角审视现代中国文学的演变,使这一研究具有了多元性。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清末民初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有更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自 1815 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到以《新青年》、《新潮》等传媒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清末民初的文化传播历史长达 100 年,但是,传媒真正对文学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却始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降,其重要标志是“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的形成直接影响了文学的流变、生产和传播。在此间,文艺杂志、报纸副刊和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有了专门的文学传播的媒介和载体,文学的大规模生产因为新式印刷技术及现代传媒的支持成为可能;现代教育体制的引入,不仅从旧的体制内解放了知识分子,使之参与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而且培养了大批的文学作者和受众。自梁启超 1902 年创办《新小说》掀起“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学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由“公共舆论”参与并导引的。所以,本书的展开主要围绕文化传播媒介的兴起、转型,以及文化制导系统的变革所带来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对话,来探索清末民初文化传播对现代中国文学变革的影响,从而更为准确地考察新文学发生的要素和渊源。

首先,传媒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书写、生产方式,而且

也使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变革,即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诸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革。这就是文本创作者身份的普及化,生产复制的机器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者的大众化。现代传媒使文学由封建士大夫特权阶层的专利品,变成了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解放了文学,加速了文学艺术的平民化过程。这既适应了开启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又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可能。

其次,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潮、新风格,使清末民初的文学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①的实验和冲动。小说、戏曲原为文学的末流,长期以来被放逐到文坛正统之外,随着开启民智的“新民”需要被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的地位,实现了艰难的蜕变和转型。诗的神性规则被打破,从“诗界革命”的通俗化、自由化到白话诗,不但诗体走向解放,而且实现了“新意境”、“新语句”^②的体认与个性化的追求。散文走出“古文”的阴影,打破了一切樊篱,直接与社会变革相结合,从而孕育了充满“魔力”的“新文体”。总之,“每一种文学体裁之改革,都以‘新民’和‘使民开化’为最急切的目标,它们一致要将人民‘从睡梦中唤醒起来’,都以改造国

① 吴组缃、季镇淮、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鸟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第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